

历史学者在解决中日历史问题中的作用

作者：步平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6-2-28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与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虽然战争已经结束60年，但是围绕战争历史的认识的分歧与差异仍然存在，甚至还是影响国家关系及民间感情的重要的障碍。历史学者对于这种历史认识分歧问题有什么样的责任呢？当然，针对否认侵略战争责任的观点的批判是学者的任务之一，在这一方面已经做了比较多的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而在此基础上，是否还应有更积极的努力呢？有鉴于此，从2002年起，我们与日本、韩国的学者与教师为尝试建立面向未来的共同历史认识而编写了《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并于今年5月在三国同时出版。出版后的这本书在各国都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人们关注最多的是为什么要试探建立面向未来的共同历史认识。我想就此谈一谈感想与体会。

第一，在战争已经结束60年后的今天，建立共同的历史认识对于东亚国际关系的正常化与向和平的方向发展十分必要与重要。

在影响东亚国际关系的历史问题中，最突出的是关于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历史的认识。但是在这一问题上的情况是，直接经历过战争的人到现在越来越少了，他们的战争体验对后代人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小。据统计，现在的人口中，战后出生的占70%以上。40—60岁的人，可能从上一辈人的口中得到关于战争的部分感性知识，而20岁左右的青少年，甚至从父母的口中，也难以得到关于战争的感性的认识。所以，对于多数人来说，关于战争的历史认识有空洞化与抽象化的趋势。而这种空洞化与抽象化的认识，容易被引导到错误的道路上，特别是引向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方向。近年来在日本相当活跃的“自由主义史观”就在向日本的青少年进行这样的引导，自由主义史观不相信有共同的历史认识，也攻击建立共同历史观的任何努力。

多数人的历史认识来自于历史教科书，也有部分来自于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对于中国人来说，关于战争的感性记忆一般是南京大屠杀、“三光作战”、细菌战与化学战等日本军队侵略与加害的事实，而对于日本普通国民的战争体验并不很了解。而在日本，多数人对于战争的感性记忆则是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东京的空袭及冲绳作战等等，这些都是普通的日本人被害的典型表现。相反，对于战争加害者责任的认识，对许多日本人来说则比较淡薄。战后，和平主义与和平思想在日本社会确实有比较大的影响，多数日本人参与和平运动也很积极，他们希望和平，反对战争，批评当年侵略了亚洲与中国的战争，但由于是站在被害者的立场上批判那场战争，很难得到战争被害国国民的理解。对于这种由于历史教育导致的两国国民层面在战争历史认识上差异，需要的是沟通与理解，也需要讨论。因为双方历史记忆的基础都是事实，问题是历史事实没有共有，没有形成共同的认识。当然，对于完全否认侵略战争的责任，美化侵略战争的右翼的历史认识，则必须批判，而不是相互理解的问题。

可见，历史事实的共有乃至建立共同的历史认识和历史观，已经不仅仅是政治层面的问题，也不是一些人的感情的问题，而是和平与发展的目标所提出的要求，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国联等具有对处理国家关系有权威的机构的设想被称为理想主义，但是理想主义的国际关系没有能够真正建立起来，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思维模式占了主导地位。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冷战的局面下，强调现实主义目标的冷战思维仍然占了主流，阻碍了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的进程。在这种国际环境中，历史认识的差异必然成为影响国家关系与发展的重要障碍。但是，也有在解决历史认识差异方面积极的努力，区域合作的实现是这一努力的结果。典型的如在欧洲，特别是德国与波兰、法国之间在谋求共同历史认识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努力。这种努力对于欧洲形成共同体的局面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而东亚地区国家间关系的紧张，则与历史认识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有相当大的关系。因此进行这一方面的努力极为重要。

第二，什么是影响中日间建立共同的历史认识的障碍？

在中日历史认识问题中，日本的历史教科书问题是首当其冲的。但是，许多人对日本历史教科书的实质性问题并不是很清楚，包括许多媒体在内，他们关注的仅仅是教科书在涉及侵略罪行时的描述方式，而对贯穿教科书的历史观问题却并不大关注。其实，日本扶桑社《新历史教科书》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其指导思想即历史观。

当我们把这本书通读之后，就会发现，强调“历史不是科学”而是“故事”，强调不能以今天的标准评价过去的不公和不正这一理论在支撑着《新历史教科书》的基本结构，《新历史教科书》是通过精心选取的历史资料，按照编者设计的叙述过程，一步一步地建立起其唯心主义史观的理论体系。

第一步，在讲述日本的远古历史的时候，突出强调日本文明的悠久与独特，竭力回避日本与亚洲大陆文明的关系，力图突破传统的日本文明受中国古文明影响的定论，相反要告诉人们近代以前3000年来的历史就是日本摆脱中国威胁的历史，是日本始终处于被殖民地化的恐怖中的认识，

第二步，以相当多的篇幅叙述“日本的神话”，把《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的部分神话与传说写到教科书中，包括讲述日本国受到神的护佑的故事等等，把神话与历史事实混合在一起，以证明日本天皇与神的密切的甚至是直系的关系和天皇制存在的正当性，力图让学生建立天皇始终拥有绝对权威的印象，

第三步，经过上述铺垫，在叙述日本近代历史的时候，教科书便强调日本是亚洲领袖的地位，把维新的成功与对外战争中的胜利与“神国日本”密切联系起来。

第四步，露骨地歌颂明治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全文刊载鼓吹为天皇献身天皇的“教育敕语”，矛盾指向现行的日本和平宪法，同时也鼓吹了军国主义时期的日本精神。

第五步，围绕日本是亚洲领袖的核心观点展开对战前发生的一切问题的叙述：近代以来的日本在亚洲的活动，当然包括战争，都是围绕保护日本在亚洲的当然的领袖地位，都是合理合法的行动，即使发生过屠杀与伤害，也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日本方面的自存自卫所必须的行动。日本人应当关注的是日本整体意识的建立，关注日本国民如何在战争中献身国家与天皇这一精神层面的问题。

以上的五步环环相扣，步步深入，构成《新历史教科书》的理论体系。从另一个角度，这一理论体系也可分解为两个子系统，即在日本的独特文明的基础上，日本国家的形成的子系统和日本天皇与国民关系的子系统。而这两个子系统恰恰构成日本在战前和战争中所竭力维护的所谓的“国体”。

对照战前日本的教科书，就不难看出，《新历史教科书》其实与战前的日本历史教科书如出一辙。战前日本历史教科书的特征就是鼓吹神国日本和天皇制的国体，《新历史教科书》同样利用日本的神话，认为神话“是一国精神性的象征”，应当受到重视，认为“有神话的国家是有风格的国家，是成熟的国家，是国民自觉性的国家”。而战前给“大日本帝国宪法”和“教育敕语”以特殊地位的历史教科书的表现方式，在《新历史教科书》中又恢复了。但是，战前的历史教育是将日本拉到战争道路的教育，是危险的教育。

因此，退回到战前水平的《新历史教科书》的上述危险的历史观，才是我们要强调的问题。

在《新历史教科书》中，对有争议的如慰安妇问题、南京大屠杀问题、劳工问题等甚至只字不提。当然，只字不提这种做法本身也表明了作者的政治立场，但是，他们更主要的力量放在以“爱国精神”为主的历史观的问题上。右翼和保守势力强调的是向日本的年青一代进行爱国教育。据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向文部科学省提交的关于修改教育基本法的意见中声称：现在的日本正处于以全球化为标志的跨越国境的巨大的竞争背景下，而日本的经济长期停滞又带来了社会的不景气。面临这样的局面，为了使日本在竞争的时代取得成功，必须培养日本年青一代适应新的国内外环境的能力。这种能力表现在掌握先进的知识，成为社会的精英；能够承受压力，遵守社会规则，具有为国家献身的精神；要爱家乡、爱国家，尊重传统文化，在此基础上成为健全的国际人。在这里，爱国精神被顺理成章地引导到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与修改日本的和平宪法问题上。但是，爱国精神在日本是与历史问题有密切联系的概念，所以许多有识之士对此感到担心，认为：围绕历史认识而开展的斗争，成了世纪之交日本最前沿的政治性课题。

第三，是否存在沟通与相互理解的基础？

以上的历史观，是横亘在中日历史认识间的重大的障碍。但是，并不是多数人愿意接受那样的历史观。战后，日本的历史教科书始终存在“改善”与“改恶”的斗争，而《新历史教科书》在2001年通过了日本文部科学省的审定后，当年被日本学校采用的比率只有0·039%。这些情况告诉我们，战后日本的和平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意识，尽管许多人对于战争加害的历史事实了解并不深刻，但是对军国主义的危险还是有一定的警惕，不希望将日本再度推向战争道路。当他们意识到《新历史教科书》的危险的倾向的时候，就作出了不采用这本教科书的决定。这一现象对人们的启示作用是很大的。历史学者应当在这一基础上沟通两国间人民的相互理解。

21世纪的国际社会是在追求和平与发展的，对国际争端，我们主张通过对话解决。对影响国家关系的历史认识问题，解决的途径也是这样。这些年来，世界面临全球化的影响，每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地越来越深地进入国际社会。全球化不仅要求政府，而且要求国民都要有国际化的眼光，应当具有更广阔的胸怀，不仅了解自己，而且要了解国际社会。我们批评日本扶桑社的《新历史教科书》，那本书就是站在狭隘的民族主义的立场上抵制全球化趋势而宣扬只有日本优秀。应当注意到，狭隘的民族主义在日本是有市场的。近年来，日本的经济持续停滞，国内弥漫着焦虑的情绪。右翼借机攻击对战争进行反省的历史认识，鼓吹“光明的日本”，认为对战争进行反省就是“自虐”。日本的右翼还坚决反对共同的历史认识，对我们编写这本书充满了敌意。但是，他们编写扶桑社那样的教科书如何能够面对21世纪的国际社会，如何能够改善日本与亚洲乃至世界各国的关系呢？

第四，明确历史观与历史认识、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首先为历史事实的共有而努力。

共同的历史观是建立在对重大问题的共同认识基础上的，而共同的历史认识则源于历史事实的共有。从这个意义上，历史事实的共有是建立共同的历史认识乃至共同历史观的基础。谈到历史事实的共有，在中日两国民众之间确实存在相当大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需要从不同的层面进行思考。

从一般的文化背景与社会环境的差异的角度来看，对本国民众来说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对另一国的民众来说，可能就如“天方夜谭”一般。如果历史事实没有实现共有，各自分别根据自己掌握的历史事实建立的历史认识就不可能相同，因此也有可能建立不同的历史观。具体在对战争问题的认识上，侵略国与被侵略的国家的国民都基于战争被害的立场，虽然同样反对战争，希望和平，但是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差异仍然相当大。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围绕战争性质与战争责任认识的对立的战争观的层面来看，存在有人用错误的历史观引导青少年的历史认识的现象。例如，对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亚洲进行的侵略与殖民主义统治的战争责任的认定，本来是通过战后的审判以及多边或双边的和约已经明确的问题，日本的政治家也在多种场合代表国家表示了对战争责任的反省。但是，从上个世纪的50年代开始，就不断有从狭隘的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否认侵略战争责任的言论的出现，先是所谓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然而就是力图在教科书中回避“侵略”的概念，而到20世纪末，则发展为侵略战争历史翻案的所谓“自由主义史观”，甚至编写出歪曲历史事实的宣扬“神国”历史的“新历史教科书”。这种历史观所依据的事实基础往往是被歪曲或篡改了的。

对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民众来说，上述两个层面的问题中，无疑是前者的影响是主要的，对多数人是解决历史事实的共有问题。共同编写历史书，在对历史事实共有的基础上，逐渐消除彼此间认识的差异，扩大认识的共同点，就会在广大的国民间建立相互的理解与信任，从而对国家关系的正常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当然，对少数人出于狭隘的意识故意否认历史事实的问题，则需要进行针锋相对的批判。由于后者往往有比较大的社会能量，他们为维护错误的历史观会强烈地反对历史事实的共有。所以解决历史事实的共有过程往往是与对错误的历史观的批判结合在一起进行的。

促进不同国家间历史事实的共有，解决历史认识的差异，其实也是实现历史学的功能，是历史学者责无旁贷的社会责任。

文章录入: zhangzhiyong 责任编辑: zhangzhiyong

- 上一篇文章: 历史学者要为促进中日间建立面向未来的共同历史认识而尽力
- 下一篇文章: 面向 2 1 世纪的中日相互理解和历史认识


[【发表评论】](#) [【加入收藏】](#) [【告诉好友】](#) [【打印此文】](#) [【关闭窗口】](#)

最新热点

最新推荐

相关文章

没有相关文章

 网友评论: (只显示最新10条。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版权所有: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地址: 北京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1号 邮编: 100006 传真: 65133283